俄国与中国的建党之路哪个更值得借鉴？

《前进报》编辑部 • July 02, 2026

昨天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中特黑帮召开庆祝大会，继续盗用和玷污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名号，掩饰其反动本质。习沙皇发表讲话歌颂建党，这是黑帮又在请神唱戏，为加强专制而自我标榜。黑帮七一大会的主题是党建，我们七一文章的主题是建党。本文希望对比百年前俄国和中国的建党历史，指出上一轮中国革命的建党道路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特殊性的道路，俄国建党道路则准备得更充分、更具普遍性，更值得今天的革命者们借鉴。

一、俄国建党作了更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中国建党的一大特点是时间非常之快。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1919年五四运动，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提出建党建议，北京上海党的早期组织诞生并开展初步工作，19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我们可以看到，就在短短的不到四年间，中国走完了从传入马克思主义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路。对比俄国，从1872年《资本论》传入俄国到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是26年，若以1883年劳动解放社为起点，那也是15年。**历史经验和革命者的能动性当然可以加速历史进程，缩短建党准备时间，但同时也难免使得早期中国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普遍不高，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客观上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较晚。早期李大钊等人的宣传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就具体的思想理论内容发挥不多；陈独秀迟至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甚至在1920年中陈独秀发表文字中还带有改良主义的幻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著作的《共产党宣言》迟至1920年才被陈望道全本翻译而出。中共早期成员理论学习不多，以至于19岁的代表刘仁静粗读马列就可以在一大上滔滔不绝地讲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便是毛泽东，在建党前读的马列著作也不甚多。

二是主观上，党的组织任务提得比理论任务更早、更突出。如陈独秀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而在陈独秀与张国焘的具体交谈中，他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接受，也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

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1]。

而俄国建党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上的。一是1883年劳动解放社成立，组织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印刷革命刊物并将其运回国内，造成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在秘密小组里，人们热情洋溢地讨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二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过理论斗争粉碎了民粹派的思想影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适用于俄国[2]。这样对比俄国1883年劳动解放社成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共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无疑是相对薄弱的。

二、俄国建党有更扎实的地方小组支撑

实事求是地说，中共的小组阶段多少也进行了一些思想统一的工作，如上海排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和国民党员戴季陶，北京共产党小组和广州共产党小组都清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但总的来讲，**中共的地方小组建设成果有限，事实上没有如俄国一样为建党准备充分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一是小组建设时间太短。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此时据中共一大仅一年时间。而俄国最早的国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布拉戈耶夫小组在1883年底成立，距离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大足有16年，1887年才被沙皇彻底镇压。80年代到90年代，俄国各地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此起彼伏，为建党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是小组的数量不足。中共的地方小组主要是北京、上海两地组织为主，广州、济南、武汉、长沙等四个地方小组是在北京、上海的支持下组建的，甚至广州的地方小组几乎就是陈独秀组建的。而俄国在1894年在全国15个城市有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光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解放协会就团结整合了20个彼得堡地区的分散小组。

三是地方小组基础不够扎实，思想资源狭隘混乱。如1920年6月上海小组成立时，起草的“党纲”（当时他们直接把自己的小组称为“共产党”）还是“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参与者也承认，“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3]

四是除了思想混乱外，此时的地方小组基本以知识分子团体为主，觉悟工人的数量很少。一大召开前，早期党的组织虽然已经开始接触工人教育工人的尝试，但毕竟成效不大，一大成立时50多名党员中只有4名是工人。这虽不影响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

质，但无疑反映中共成立之初的工人工作基础有限。而俄国地方小组的工人基础非常坚实，俄国各城市的先进工人从19世纪80年代就在热心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从民意主义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80年代末彼得堡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勃鲁斯涅夫小组”，由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革命大学生和工人小组合并而成，领导这个组织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中心组和一个工人中心组，知识分子中心组负责培训宣传员、制定学习计划、总结组织活动经验，而工人中心组领导各基层工人小组，负责调配宣传员[4]。

三、俄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对比反映建党水平

中共一大上产生了若干争论：一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有代表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要组织知识分子（李汉俊）；有代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目的，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刘仁静）；二是对南北政府和孙中山的态度问题，有代表认为不能和南方政府发生联系，不能与孙中山共事；三是党员是否能做官和当国会议员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多数代表不赞成李，李虽未放弃观点，但表示可以服从多数；会场氛围和谐，没有指责李汉俊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刘多年后也认为自己观点不成熟，反对把自己作为“左”的代表。在第二、第三个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孙中山仍有进步作用并反对议会斗争。后两个问题与中国革命形势相关，但在一大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代表们也未详深论。

由此可见，一些党史著作认为一大产生了激烈冲突甚至是路线斗争，其实是言过其实。**因为以上三个问题，总的来说，是因为当时的革命者思想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对中国的革命现实缺乏马列主义的分析，正确或错误的倾向都还很模糊，因此远没有达到路线斗争的水平**[5]。

从中共一大的成果来看，中共继承了俄国革命经验，明确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基本方向，但是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分析判断，对当下的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革命力量思考不多。“一般代表多以共产革命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即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现在也尚不能琢磨，因而无法作具体的规定”（张国焘），因此一大只通过了抽象的共识，如“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而没有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革命道路。

对比俄国的一大和二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大确立了党的名称，但缺乏思想统一，没有制定出党的革命纲领，苏共党史对此次会议的评价不高，认为仅在形式上完成建党任务。而二大上，列宁通过政治报计划，确立了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二大上真正建立起来[7]。二大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党纲，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科学地规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目

标。其中的最高纲领包括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则包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农村中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把地主夺去的农民土地（“割地”）归还给农民[8]。

总的来讲，中俄两国的建党路径大不相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专制条件下必须通过秘密的政治报才能把各地小组团结起来形成政党；而中国则在俄国经验的指导下，在理论基础薄弱、小组建设不足、缺乏思想统一过程的种种困难之下，先行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此后中共飞速发展，但建党不足的隐患影响深远：

一是中共在大革命中飞速发展，但是党的基础薄弱，没有把握住革命高潮。一面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开展国共合作，利用民主革命的放大作用使得自身力量飞快发展，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但另一面，党的基础薄弱，在革命形势前没有把握住革命高潮。在陈独秀右倾路线的影响下，党没有积极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及时掌握政权和军队，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现实力量，导致在1927年遭遇失败。

二是中共整体理论修养不足，诞生后又很快投入到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路线斗争，缺乏对革命道路、革命策略的思考。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对革命失败的总结并不彻底；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长期从事激烈的军事斗争和局部政权建设，被左倾错误笼罩。直到抗战期间，毛泽东通过整风运动、编写《六大以来》等斗争批判党内“左倾”错误，最终召开七大，彻底粉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路线斗争问题长期困扰中共，不能不说是建党的缺憾带来的。

四、我们今天应如何走向建党？

早期中共因为客观历史条件限制，建党之初诚然有着种种不足，但是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中共仍然完成建党任务，并在革命风暴中成长壮大，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早年的不足对中共来说可以用后面的补课弥补，关键是抓住革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自觉力量的作用。

而今天我们的情况则不大相同：今天中国的国情是黑帮专制统治下的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共产国际的外部力量帮助建党，思想界充斥着黑帮假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西马修正主义等反动思潮，左翼内部也不乏经济主义（融工思潮）、“左”倾学理主义等错误倾向，各左翼小组还很涣散、缺乏继承性……**从各种意义上，我们的建党路径都更接近俄国而非1921年的中国。中共建党已成历史，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中共建党中吸取教训，把今天的建党工作做得更扎实。**我们今天要建党，有这么几步路要走：

第一，作好思想理论准备，突出的任务是学习列宁主义，特别是建党理论。

中共建党的理论水平不足，以至于毛泽东在1938年还在感慨“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我们要吸取中共这一教训，认真学习理论。在今天建党的道路上，最值得学习的无疑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9]今天我们建党可借鉴的材料包括俄国革命经验、中国上一轮运动的经验和当下左翼运动的经验。要科学研究这些材料，必须学习列宁主义，学习列宁如何处理历史经验来探索建党路线。

第二，建立和巩固地方小组，在小组内部进行思想学习和组织建设，努力开拓工人工作，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中共地方小组建设不足，建党仓促。我们今天要建党，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方小组的基础上，否则只是中毛共式的形式建党或是简单的横向联合，只能走向俄国的一大而非二大。地方小组的建设，一是要在小组内部通过学习、会议等形式达成思想和组织一致，二是要树立好的组织原则和作风，贯彻集中和民主，注意队伍的稳定团结，能够吸纳新人、培养骨干，正确处理两种矛盾；三是要扎根地方开拓具体工作（学习、宣传、组织），尤其是工人工作，让我们的党建立在与无产阶级有着深厚联系的基础上。

第三，各个革命地方小组在思想一致的前提下，通过政治报路线实质统一起来。

列宁的政治报路线至少包含三个要点：用政治报进行思想理论斗争，坚决批判错误思想，提高革命者的思想理论修养，使各小组达成思想上的统一；通过代办员网络，形成各组织事实上的接触和融合；用政治报和政党传承经验，突破手工业的工作方式和小组状态，避免小组在专制黑帮打击下旋起旋灭，让运动具有计划性和继承性。俄国二大能够实质建党，关键就在于政治报路线在实质上促进各小组的统一。中共的一大是国际帮助下召开的，我们将来的一大只有走通政治报道路才能实现。

欢迎革命同志们关注电报频道《前进报》并来稿交流，包括形势分析、理论争鸣、国情研究、斗争报道、工厂通讯等。

投稿邮箱：Vorwarts_2023@proton.me

读者群：https://t.me/Vperyod_2023

使用实名手机号注册telegram有安全风险，没有telegram账号的同志们可通过邮箱订阅《前进报》：用墙外邮箱（如protonmail、gmail等）发送邮件至《前进报》投稿邮箱Vorwarts_2023@proton.me，即可订阅。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6页。

[2]《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155-178页。

[3]《“一大”前后》第二册，第36页。

[4]《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194-212页。

[5]《开天辟地大事变》，第299-302页。

[6]《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cp-1921-1949/01/001.htm

[7]列宁《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

[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7/045.htm

[9]列宁：《为〈工人报〉写的文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2.htm

Report content on this page